

休休有容譚延闓

蔣君章

譚都督同情革命黨

湖南都督譚延闓在二次革命被袁世凱免職時，他還不是國民黨籍，但是譚都督是舊式知識分子中的開明分子，傾向於國民黨，事實上和國民黨採取同樣的行動，是沒有問題的，因此，譚都督之見忌於袁世凱是必然的。譚都督之同情於革命黨人，根據可靠的資料，早在光緒三十年。彭楚珩的湖南光復始末記，有下列的一段話。

民國紀元前一年春（辛亥），譚人鳳、焦達峯兩先生，先後返省。焦達峯與湖北黨員聯成一氣，因湘鄂接壤，唇齒相依，苟鄂方事起，則湘省響應。嗣以漢口機關破壞，鄂督瑞澂及湘撫余誠格，繳收新軍槍枝。誠格復指賈太傅祠爲革命黨淵藪，派警監視。湘紳蕭榮爵、楊鞏等，暗請警道及長沙知縣沈瀛，羅織黨獄。幸值譚延闓先生以爭路事自京歸，誠格示以黨員名單。譚先生誦謂：「若輩皆酒色之徒，不足畏懼」，得免於難。

按此年與譚祖安先生年譜不合。年譜，先生爲爭路而北入京師，是在光緒三十四年戊申，八月尙在京，八月以後始南歸。則爭路而歸云云，非事實也。根據年譜，辛亥年四月，各省諮議局懇請清政府提前實

施君主立憲，先生以湖南諮議局長的資格，入京參加會議，中秋前三日出京，以時日核之，正與余誠格以黨人名單示先生時相當。又先生之同情於革命黨人，尚有較早於此的一件事，那就是光緒三十年四月，先生以朝考一等一名以翰林院庶吉士用，七月到職，不久，請假南歸。是秋，黃克強先生任明德學堂教員，祕



設華興會，發展革命。王先謙攻之甚力，同志中有被捕者，詞連黃先生，巡撫陸元鼎密令捕之。時督練處主管及提學使，皆與譚先生交甚篤，以先生故，緩其行動，克強先生乃得脫。先生曾題黃先生手扎，有云：

「甲辰，克強先生爲明德學堂教習，密謀革命，所謂華興票也。事覺，乃匿黃溪家，揚揚若無事，臥讀書不輟，每飯三碗，其所刻印章名籍，皆在長沙府中學堂，黃溪乘興往，盡納與中以歸，數日稍懈

，乃入聖公會。居久之，僑裝東去，僉壽臣（明頤）言是日故少緩之，使在事者得避去，若持之急，皆不得脫云。」（年譜光緒三十年甲辰）

由此，可知先生之同情革命黨人而庇護之，早在光緒三十年，故先生此時，雖非革命黨人，實早已同情於革命了。

武漢首義以後，不三日而三鎮底定，清廷起用袁世凱，由馮國璋、段祺瑞率一、二兩軍直撲陽夏，武昌垂危，黎元洪大懼，召集革命黨人開會。黎問：「倘瑞澂張彪請兵，水陸並進，將若何？且海軍尤利害，將退避何處？」鄧炳三答以退湖南。黎問：「湖南有何把握？」鄧答：「焦達峯已約下月初舉事。」由此，可知湖南起義，對鞏固武昌革命軍地位的重要性。時人論湖南之形勢云：「湖南處長江南岸各省之中樞，洞庭控其北，五嶺障其南，東接豫章，西通川黔，與鄂贛則如輔車相依，與粵黔則如咽喉相扼，形勢險要。……故湖南首先響應武漢，使黨軍無後顧之憂，粵、桂受隔絕之困，豫章、黔中，亦同受威脅，使各地同志得以紛紛響應，其意義之重大，實不僅使湖南一省脫離專制領域，且大有功於全國革命也。」故焦達峯等在湖南起義成功，武昌的革命軍得有保障。焦等在舉義成功後，略事部署，即出兵援鄂，與北洋軍鏖戰於陽夏之間者達數十日之久。由此，可知焦達峯湖南起義的成功，對武昌首義及其地位的鞏固，有其絕對的重要性。焦達峯不久遇害，由譚先生繼任都督，其支持武漢的努力，與焦達峯等，即其重要性與焦達峯等。我們談民國初年的風雲人物，實不能不談到譚先生對革命大局的貢獻。

功業勳望超越前人

譚延闓先生是湖南茶陵人，茶陵雖在湘東南，但是清制是屬於長沙府的。他的故鄉是石狀鄉，但是譚先生的出生地是杭州，那是因爲他的老太爺文勤公鍾麟先生那個時候是浙江巡撫。年譜云：「光緒五年己卯公生。是歲，文勤公五十八歲，自陝西巡撫五年任滿入都。十月調補浙江巡撫，加兵部尚書銜，十二月十四日卯時，李太夫人生公於杭州節署。公將生時，文勤公方寢，夢何文安公凌漢衣冠來拜，遽驚寢，公適生，因名曰祖安，一字組盒，亦字无畏，初名寶璐，後易今名。」世稱先生爲譚畏公者，蓋由其无畏之字而來。

譚文勤公鍾麟是清季名臣，歷任知府巡撫、總督等方面大員，所至節省公帑，整理財政，省民疾苦，誅鋤豪強，積儲倉穀，以備災荒，在貧瘠荒旱省區，政聲尤佳。其在陝甘總督任內，正值左文襄公西平回亂。文勤担任後方勤務，糧餉無缺，而民無疾苦，極爲文襄所稱道，至請命於清政府，特加褒賞，其治績之佳，由此可知。譚先生的生母李太夫人，是河北宛平縣人，早喪父母，與弟依世父同住，有賢名。同治十年辛未歲，文勤入朝，奉命任陝西布政使，以陳太夫人患病，不能隨至任所，聞李太夫人明慧而納聘之。卒於民國四年十一月，時在滬寓，而先生則服官桑梓，任湖南省長兼督軍，聞母疾馳返上海，而李太夫人已先卒，是爲先生畢生最大的憾事。

譚文勤公任職浙江巡撫，始於光緒五年，至光緒七年，調陞陝甘總督，駐節蘭州，先後凡七年，至光緒十四年始以目疾再三乞養而離職。在這一段期間，先生都在蘭州。七歲開始讀書，其啓蒙師爲蘭州張寶齋先生，是一位長於文字學的老師，先生兒時雜憶詩云：「霜鬢龐眉一尺鬚，萬言撐腹註虫魚；薰籠圍坐聽閑話，更乞先生爲甚酥。」由此可知這位張老師是長鬚龐眉而好說故事的飽學之士。十一歲時已習作制藝文字。年譜云：「丁亥，先公以目疾乞假，每上燈，獨坐鐵押房，使人讀公事文牘畢，呼余及亡姊亡弟共坐室隅，各作破題一，或試帖二句，間日互易，皆先公口授。……有時不知書寫，則先兄從旁代書之，復誦無訛，則各與錢十文，乃起就睡。」由此，可知文勤課子之勤，且常作鼓勵，此亦舊式教育之新法，先生十歲時，已習作文，由文勤口授，次日書之，而由張寶齋先生評論之。

光緒十五年，文勤公受代，南至西安，由華陰楊叟針治，目復明，先生則從姚世貞受教。是年十月返抵長沙，居荷花池私邸，先生則從學於李少蘇，時年十一歲。文勤公家居休養，未及一年，湖南巡撫轉來清廷政府寄，問病狀，囑病愈入京。凡此都足示清廷對譚文勤的依畀之深。文勤在茶陵省墓後，卽於是年十二月入京，先生仍在長沙從武陵陳春塢治學。

光緒十七年，清政府任譚文勤爲吏部侍郎，時年七十，翁同龢與文勤交甚厚，知其目愈入京任官，爲聯以贈之曰：「斯人一出世無比，君目再明天有功」。及文勤七十生日，翁復書一聯以祝之曰：「謝安舟楫風還起，庚信文章老更成」，蓋集杜甫詩句而成，以謝安的勳業和庚信的文章來比擬文勤，足證翁同龢

對文勤公之推許了。是年五月，先生始侍李太夫人至京。先生嘗自記己已立夏課題云：「此數文最爲先公所賞，嘗示友朋。翁文恭、徐頌師皆嘗來索看，吾亦常拜翁丈於廳事。」翁同龢日記中亦曾記及此事，稱許先生爲奇才。時先生年才十三歲耳。

光緒十八年，清政府任譚文勤爲浙閩總督，五月赴任，先生隨行。道出長辛店，李太夫人便謁先墓，其弟安清，相隨南行，居湘潭，爲娶室，後仍無嗣，先生參拜之。先生兒時雜憶詩，有云：「相逢姊弟歎無家，雪涕親斟飯後茶，說與痴兒知外氏，長辛店北路三叉」，蓋卽記此。是年七月，先生同長沙，應童子試（卽考秀才），入府學爲附生，試畢仍回福州，從陳春陽、姜竹軒兩先生受教。翌年，清政府舉辦恩科鄉試，先生又返長沙參加，試畢仍回福州。二十年，卽甲午年，是中日戰爭發生之年，文勤先調四川總督，未及赴任，改任兩廣總督，蓋重海防也。是年先生又回湘參加鄉試。翌年，文勤蒞粵督，先生則與南昌布政使方右銘之女結婚，時先生年十七歲，方右銘是直隸清苑人。光緒二十三年六月，先生回鄉應試優貢，以第二名高第入榜。八月應鄉試，仍不售。回廣州，從南海丁伯厚受課時藝，光緒二十五年，文勤公被召入京，乞假省墓，先生隨行，省墓後先生仍回粵從丁伯厚學如故。文勤自奉召後，卽乞假南歸，住長沙故居，先生隨卽返家，從劉采九受教。是年，文勤公八十歲，不稱觴。翌年鄉試，先生中試第九十九名舉人，時先生年二十四歲，是年龍紱瑞夷溪創明德學堂於長沙，胡子靖任校長，先生應邀參加，共董校事，李太夫人命出資助之。龍氏並創正經學堂，先生亦經常出資爲助，是爲先生從事於學校教育之始。

光緒三十年，先生赴開封應甲辰科會試，試畢即歸，榜發，以第一名入選，是即所謂會元，爲湖南二百多年來的第一次會元，故王闓運湘綺樓日記中盛稱之。此後，科舉取消，改由學校訓士，故先生實爲末科會元。是年四月，入都應殿試，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賜進士出身，朝考一等第一名，遂爲翰林院庶吉士，七月到職，不久告假南歸。翼護黃克強先生脫險，即在此時。譚畏公對於清朝政府所給的職務，似乎都不感興趣，翰林院庶吉士雖就而不久告假；後來在辛亥年爲了要清政府縮短立憲的準備時期而入京，時宗室奕劻爲內閣總理大臣，滿人那桐與漢人徐世昌爲協理大臣，內閣下設五個局，徐世昌要他擔任一個局長的職位，先生亦不就。由此，我們可以理解先生雖然是滿清政府科場得意的人物，但是他似乎立志不做滿清政府的官，這和他同情革命黨人的意志是一貫的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，先生年二十七歲，那是他痛苦的一年。是年，他的尊人文勤公逝世，先生爲撰行狀，歷述其服官經過與愛民剛毅等特性，從行狀中，可知先生兄弟五人：長寶箴，附貢生；次寶符，早卒；先生行三，翰林院庶吉士；四恩闈，從一品蔭生；五澤闈，兵部郎中。先生以下三兄弟，皆李太夫人出。兄弟五人中，先生之科舉功名最高，其後德業亦最高，蓋繼文勤公之科名勲業者惟先生一人。先生後來任國民黨中央常委，國民政府常務委員、主席，卒時的職位是行政院長，其勳望猶在文勤公之上。譚文勤公是道光二十三年提學試第二入州學，明年補廩膳生，二十九年鄉試中式，咸豐六年會試中式，賜進士出身，致翰林院庶吉士。父子翰林，誠科舉場中的佳話了。文勤公享年八十有四，但先生享年則僅五十二歲耳。

先生的處世爲政，得到文勤公的身教者甚多。

根據先府君行狀來分析，譚文勤的爲政和處世的特點，略有下列諸端：

1. 直聲 同治元年派任湖北鄉試副考官，湖廣總督官文以施南府在清無舉人中式，主張別出試卷，接引邊郡例以便利之。試官皆稱善，文勤堅持不可更易舊章，他說：「安知施南府終不舉者？而苗疆例之！」是科施南籍舉人被錄取者凡七人，官文因此大慚。同治三年，宗室恭親王受旨嚴譴，罷議政王，下九鄉科道議罪，諸親貴大臣，都主張：「先有成勞，宜得免議。」依次請與議者簽名。至文勤，閱其稿，抗言不可。他說：「朝廷惟有所疑，故令集議，奈何首鼠持兩端？某不具名。」退而具奏，謂：恭親王召對之時，語言不檢，自蹈愆尤，誠不得爲無罪，經天威震疊，必當愧悔，海內多事，全賴上下一心，共資康濟，而懿親爲尤甚，若廟堂之上，先啓猜嫌，根本之地，未能和協，駭中外之觀聽，增宵旰之憂勞，於大局實有關繫；至用舍之權，操之自主，非臣下所敢議。奏成，爭欲聯名者四十餘人，帝大悟，仍用恭忠親王直軍機，用平大亂。其正直率類此。

2. 不畏強禦 在杭州知府任內，時值大亂之後，悉心恤流亡，理獄訟，清賦稅。豪強徐正魁、張桂林等，橫行鄉里，擅殺，公奪良家婦，不法多端，人人側目，文勤誘捕之，將置之法，或謂徐黨羽極衆，急恐生變，文勤不從，終置之於法。法租廣州灣，其所索幾盡吳川、遂溪兩縣，且及東海、碇州二島，文勤堅持不許，僵持一年，吳川縣民組團練以拒法軍，文勤則遣軍五千助之。光緒二十五年，清廷派廣西提督

蘇元春至廣州灣議界，文勤指示可許與不可許諸事；及元春與法開議，悉遵法方要求，文勤疏勘之，清廢約。會遂溪縣民團與法方衝突，傷其渠，法向清廷要求，必斬知縣。文勤電陳自負其責，與知縣無關，並以法兵槍殺百姓，請清廷要求賠償。其不畏強禦之精神，大率類此。

3. 重秩序 在兩廣總督任內，盜賊橫行，吏治不修，綱紀廢弛，貪虐成風。諸不法者，文勤一一繩之以法。他了解廣東諸爲非不法事之肇源，厥爲賭博。他說：「粵患盜多，非民性然也，充欲倖獲之心不至爲盜不止，則賭爲之也。終歲捕斬以千計，而盜不少戢。此非禁賭不爲功。」乃革除舊日定制的賭餉，盡封賭館，犯必嚴懲，其變相的賭博，亦嚴禁之。終其任賭禁不弛。其爲政重根本，大率類此。

4. 尙仁義 文勤爲政，崇法務信。粵有閩商之制。閩商者，覆鄉會試者姓名，聽人射之，多中者勝，亦賭博之一也，文勤惡而欲禁之。但以閩商納餉，部不准禁。其商有獨佔權，每六年易一次，諸欲爲閩商者，競送賄賂於當道，往往爲賄多者所得。文勤下令，欲爲閩商者，須輸一百六十萬，總督以下，不得更索一錢。輸不如數，而逾規定期限者，則先輸之資沒收。或以爲過嚴，文勤則曰：「固知之，不如此，不足以示信；粵人久虛視文告，競思以他途進，吾所爲亦使知法不可嘗試也。」廣東對外貿易，繁於他省，交涉甚多，文勤對此，一以法理與條約爲據，係毫不肯遷就，雖恫喝亦不退讓。此其崇法尙信之例。

5. 忠與義 廣州灣交涉文勤疏勘蘇元春無結果，知國事已不可爲，乃稱病奏請辭職，先後凡五次，清廷最後給假兩月養病，並令赴京陛見。光緒二十六年春入京，請開缺。時拳亂已起，清政府中重要官吏都

敦促離京。文勤卻之，他的理由是：「明知無官守，留無益；然常爲大臣，觀國難，忍先去耶！」這是他對清政府的忠和義。有一個文勤舊日的同年生劉某，歿於京師，文勤歸其喪於家，並爲之經紀，晚年更修葺其墓。福州將軍卒，子幼，負公私債巨萬。文勤以署任所入代償，有餘悉以爲贖。將吏有勞動，死無以歸，必厚贈賻金，存活其妻子，如是者凡十餘人。視僚屬若子弟，惟用其長，不以喜怒進退。這些都是文勤的忠和義的例子。

文勤的身教，對譚長公的服官、治事、處世、對人，樹立了很好榜樣，發生了極大的作用。惟文勤性嚴，先生則易以溫和，是其異耳。父母之喪，均稱丁憂，應辭官守制。譚長公本未居官，故在丁憂期間，任長沙中路師範監督（相當於後日的校長）。翌年，葬文勤於善化白泉荷葉塘，湘省名儒王闓運爲撰神道碑。服闋，照例應參加翰林院散館考試。時岑春萱任湖南巡撫，以湖南教育不可一日無先生主持，特奏請免。由此，可知先生當時在湖南教育界的地位之重要。年譜云：「張筱浦時莞學務，有關教育大計，悉就公諮而後行；風氣日開，而莘莘學士，翕然從風矣」。蓋紀實也。

翼護黃興安全離湘

光緒三十二年，湖南鐵路公司成立，聘先生爲諮議官。時張之洞以鐵路商辦，集資不易，進行遲緩，改爲官督商辦。翌年，張之洞由湖廣總督調任軍機大臣，兼管學部及督辦粵漢鐵路。乃召集郵傳部及三省

督撫、任事官紳舉行會議，湘省推先生爲代表，三十四年入都議事。時湘人主先辦株韶段，張之洞則勸湘人不必爭，先生對此頗不贊同。南歸後，適黃興革命案發，先生翼護之，使得安全離湘。

清政府鑒於各地革命起義，不斷發生；而君主立憲派則主張仿英國制度，實施君主立憲，其說亦不脛而行，思有以阻撓而緩和之；乃倡準備君憲之說，於中央成立諮議院，於各省成立諮議局，並派五大臣出國考察，其所謂準備期間，則定爲九年。光緒三十三年下令各省，一律於一年內組成諮議局。湖南的諮議局，成立於光緒三十四年，議員八十二名，局長由議員選舉，以得票過半數者爲當選人。選舉結果，先生當選爲局長，足證先生在湘人心目中的人望之高。時先生年三十歲。

宣統三年，各省諮議局以預備立憲期限九年，實爲太長，紛起要求縮短，主張在京召集聯合會議以請求之。是年四月，先生入都，參加此項會議。但清廷堅持原議，不欲改變，故會議並無結果。時清政府任命徐世昌爲內閣總理協辦大臣，徐欲以局長職位畀先生，先生拒之，即行南返，其阻延余誠格巡撫搜查賈太傅祠的革命黨人，即在此時。八月十九日武昌首義，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峯等於九月初一日起義於長沙以響應之，湖南遂告光復。衆推先生爲都督，先生卻之，於是焦達峯爲都督，陳作新副之。時北洋軍已進攻陽夏，焦等乃起湘中之師赴援。時立憲黨人在湘亦頻有活動，並無成就；及湖南光復，湘師北援，乃造作謠言，謂武昌有協餉數十萬至湖南，爲都督所控制，不發給新軍，而專門接濟會黨，因而造成新軍與焦達峯之間的誤會，新軍紛紛索餉，焦達峯與陳作新親與懇談，以誠相感格，但無效，二人同時遇害。湘人乃

擁至先生寓所，環請先生就都督職，以免地方糜爛。先生以桑梓安危所繫，慷慨受命，時距湖南光復僅十餘日。先生就任後的第一件事，是嚴禁濫殺與報復。以先生德望之重，不逞之徒，知所警惕，秩序賴以安定，仍邊援鄂政策，湘軍不斷北上，參加陽夏的保衛戰。黃克強先生所指揮的陽夏鏖戰，其主力部隊，以湘軍佔重要地位。由此，可知湘南光復及譚長公繼焦達峯而任湘南都督，對鞏固武昌革命基地的重要性。

真切認識革命局勢

先生就任湖南都督後，發表通電甚多，其中有文獻價值者亦不少，茲錄數通如下：

1. 贊成全國聯合會議與統一紙幣發行之通電：

（銜略）此次各省起義，宣布獨立，係對滿廷之獨立，非各自為政也。現在大江南北，悉就範圍，海軍抒誠，已得全數，民國宗旨，同主共和，則獨立二字，尤乖名實。不獨中山來電，外人疑難，或因此團結未堅，內則分裂以省界，外則相侵以列強，殊非新中華民國所宜。同是炎黃子孫，斷不能稍有畛域，前蘇州程都督全國聯合會議，湘省已極贊成；惟現在北虜未滅，亟待攻討，除軍事進行應由各省聯合計劃外，廣東胡都督統一財政之說，實為切要之圖，所謂各省先行預備金，組織總機關，發行民國紙幣，各省一律流通一節，於餉源關係尤鉅；惟設立地點，發行額數，各項預備金若干？自應亟電鄂軍政府議決，仍希各省協同力進。以偉大民族，共建偉大國家，雄視五洲，當無倫比。」（下略）

2. 與鄂軍規復荊襄通電

「民立報轉各都督各軍政分府、各報館公鑒：敝省以荆襄據武漢上游，爲湘蜀門戶，軍事計劃，在所必爭；故派王統領正雅率領往取。十月初六日，與滿兵戰於沙市附近之草市，陣斃敵軍官一員，兵卒數十名；傷百數十名，奪獲槍械數十件，繡龍黃綾鐵甲一具；我兵雖有受傷數人，無喪亡。同時，鄂軍出取襄陽，軍隊亦甚得手，反正部隊，至十三日午後六時，會同宜昌軍司唐犧支，分搏荊州東北門，王攻西南門，鏖戰至次晨九時始停。：是役，王統領爲流彈中腿，猶裹創親自督隊前進，敵兵死百數十，傷三百餘人。自是，王軍遂駐紮門外，不時搏擊，敵兵盡投降，獲槍二百桿。是夕，滿統領衡齡自盡，襄陽道喜齡全家自盡，王統領在南門外行營受降，敵兵自佐領以下均叩頭求活，繳槍七百餘枝。：都統聯魁放砲跪迎，叩頭求活。所有槍枝器械，悉數繳存，現令王統領籌辦善後事宜。從此光復蜀湘鄂，聯絡一氣，北伐無左顧之憂矣。湘督譚延闓江」

3. 湘桂聯軍北援並建議粵閩軍攻津電

「：湘鄂一家，安危同繫。現在桂軍已於初七日在永州出發，兼程赴敵。數處已電請廣東胡都督、福州孫都督，整頓海軍，連合吳湘軍艦，直攻天津，以擊敵兵之尾；並請孫都督練派精兵，由海道來援；電請貴州楊都督，出兵銅仁，與我軍會合，取荆襄，出沙洋，以擊敵兵之腰；更電桂林沈都督、南寧陸都督，加派老練之兵，與敝省會師，剋期赴援。尙望堅守武昌，以圖合剿，決不稍存畛域，貽誤中華

大局。(辛亥十月初九日)

4. 電鄂陳戰略意見

「此時荆襄既爲我有，敵窺伺南京，擾我腹心，我軍自應猛力進據河南，西進陝西，南扼漢口一帶，抄出敵兵後路，則漢口不攻自破。再用支隊遊擊山東，而後會師北進，則南京可以無虞，賊亦有瓜熟蒂落之勢，天下可定也。」(辛亥十一月初六日)

5. 荊州善後問題電

「頃接王統領正雅電稱：二十八日，滿將聯魁親賞印信呈繳，突求暫留駐荊，保全旂衆殘喘。：其要求者：(一)發恩餉，(二)給出境謀生護照，(三)擬佃原有公田。竊荆防男女，數逾二萬，老稚文弱居十之九，生計之窮，已達極點。既允納款，亦係蒼生，安插保全，誠屬難已。無如待拯既多，需款必重，身居客位，何敢自承？乃力勸滿降，以救全城漢滿生命，比國神父馬修德代爲請命，語極誠懇。又沙市商團，亦倚雅軍自安，求分隊駐沙，保全秩序，自三至四，情詞俱極悲抑，應之既無其力，拒之實又不情，應請公示以方針，俾得遵守。如令雅暫留，則希電知武昌，加給照會，許以便宜，庶在雅可免主客之嫌，而在滿可宏生成之德。：」(辛亥十一月初六日)

譚長公自接任湖南都督後，對外通電甚多，上面所錄，僅爲一部分。但在這一部分電報中，我們可以理解譚氏對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之認識的真切，絕不如被任都督以後的黎元洪仍首鼠兩端，狐疑不定

。其對援鄂之努力，除盡湘省本身的全力外，並電約其他各省，盡力增援，對保全武昌，可謂已盡最大之努力。其派軍進取荆襄，絕不是乘機擴充地盤，而是爲了打通東川，腰擊北軍，並爲北伐軍闢一通道，完全是爲大局着想。而其在荆湘軍之行動，一一請鄂軍政府決定，以明主客之分。這尤其是譚長公處事的分際。按荆州滿兵問題之情形，電陳鄂軍政府後，鄂軍政府即定大綱，以資救濟。其辦法如下：（一）無財產者，均按甲酌給謀生費若干元；（二）無財產者，除與以必要生計費外，其餘財產均歸民軍保護；（三）凡護送出境者，由民軍指定地點，分散安置；（四）准其隨地佃田耕種，不必指定公田。荆州二萬多滿人的生計，總算得到了解決，這都拜的是譚長公的德澤。由上所述，可知譚長公雖然出身於閥閱之家，雖然滿清科場的得意人物，早年並未從事於革命運動，但其立志不作清政府的官，而致力於辦教育，開風氣，得便則予革命黨人以翼護，自任湘督以後，即矢志站在革命陣線，與清爲敵，可知他對革命運動，早已傾心，從他的行動中，已有一貫的線索可尋，則其此後之獻身革命，正所謂其來有自了。

擁護國父舉義討袁

各省紛派代表，組織聯合會議，那便是後來參議院的前身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是由各省代表選舉的，臨時政府的組織大綱也是各省代表通過的。在臨時大總統選舉之前，先有中央大都督的建議，嗣又有中央大元的建議。黃興百戰功高，大家都屬意他爲大元帥；鄂省首先舉義，黎元洪遂被推爲中央大都督。

在陽夏保衛戰中，湘鄂兩方，頗滋誤會，鄂方對黃興指揮不滿，黃興對鄂軍應援與作戰均不力，也表示不滿。及臨時大總統人選問題發生，黎元洪之呼聲甚高，及國父致電民立報，亦推黎元洪，革命黨人頗示異議，民立報發表此電時，加以按語，一方面贊揚國父的謙德，一方面表示總統問題，將由民意解決，自此連日發表社論，主張臨時大總統，非革命運動之創始人莫屬。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全國，籲請國父返國，組織臨時政府，謂「中山先生爲首創革命之人，中外人民皆深信仰，組織臨時政府，舍伊莫屬」。及滬軍都督陳其美發布孫先生返國的通電，譚氏首先通電歡迎，謂：「聞公到滬，飛電傳來，巨躍三百，謹代表全湘百萬生民歡迎，先生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」等語。由此，可知譚氏並有贊成孫先生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意。自此，各省都督、軍政分府以及省議會等，相繼通電，一面歡迎，一面擁護。譚氏此電，雖非創意，實早已存之於心，故立即響應，形成新總統人選的一致呼聲。各省獨立以後的都督，都是按照同盟會的規定，經由各省紳耆議會等推舉。譚畏公之繼任湘都，也是這樣的。及國父辭臨時大總統而由袁世凱繼任，袁世凱爲了要把各省由推選產生的都督，置於其控制之下，乃改由政府任命。民國元年七月，正式任命譚氏爲湖南都督，這是袁世凱注意湖南和密謀湖南之始，時湘省在體制上雖經劇變，但是未經戰亂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商旅往來如故，故賦稅收入漸增，此殆爲袁世凱窺伺湖南的另一原因。譚氏以湘人而治湘，故一切以安民爲根本，凡事持以鎮定，故桀傲恃功者雖有異謀，終能消除於無形。又鑒於兵多餉重，民衆負擔加重，故裁兵以節餉，以輕民負而裕財政，其求治心切，由此可知。大體上民黨都督，都認

爲法律與政治體制，足可制袁世凱之野心有餘，故不再恃兵力以爲抵制，如柏文蔚任安徽都督，亦如譚長公之治湘，以裁兵節餉爲要政。初不料袁世凱之野心，絕非法律與制度所可約束，民黨都督之裁兵，求治固屬必需，對袁反而自毀實力，授以可乘之隙。民國二年七月，長沙勸潭寺軍械局突然發生大火，焚燒三日三夜，所存軍械，焚棄殆盡，這是袁世凱對付湖南都督的顯著陰謀。

先是，二年二月間，宋教仁被刺於上海北火車站，國民黨即有討袁世凱之議；至五月間，宋案的幕後主使者是袁世凱，真相大白，國民黨討袁運動，發展益爲激進。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舉義，十五日黃興在南京宣布獨立，十六日滬軍推陳其美爲討袁軍總司令，皖、粵、閩繼起討袁，是爲二次革命。長沙軍械局之大火，即發生於七月，其爲袁之陰謀，顯然可見。譚長公權衡局勢，實力損毀已多，發兵勝算難操，但不發兵則義所不許，乃於是月二十五日舉義，即出兵援贛，惟湖口已敗，湘軍只能與後退之贛省義軍取得聯繫而已。各省義軍相繼失敗，譚長公一以鎮靜處之，尙能相安於一時；但袁世凱對湘是絕對不會放鬆的。十月間，袁世凱命湯薌銘至湖南查辦，譚氏聞知其用意，乃令湯薌銘代理都督，留呂茲霽辦理交代，乘江犀艦離長沙。文武官吏、紳商各界以及學生等，自動至江干相送，有爲之泣下者。時黎元洪已被選爲副總統，仍兼鄂督，派巡艦迎先生，先生在武昌勾留若干日，遍遊附近名勝，然後乘平漢車北上。

時熊希齡任國務院總理，知先生入京，派車迎之，即寓於熊宅。袁世凱雖已免譚氏職，但銜之仍深，視其陸軍上將銜，先生固不以爲意也。翌年二月出京至青島，旋返滬，省視李太夫人。先生對青島之環境

，相當歡喜，乃於次月復去，買西人宅，爲將來久居計，事訖南行，與舊日友好俞明震兄弟及呂苾齋遊杭州。四月還住青島，舊日師友陸潤庠、趙爾巽、徐世昌等皆寓青島，時相過從，頗得交往之樂。是年八月，歐戰爆發，日本藉英日同盟之名，對德作戰，將攻青島，先生乃取道陸路，經濟南、南京等地，重返上海，以習字爲日課之一，臨麻姑仙壇記二十遍。先生此後書法，遂以顏字爲宗，時先生年三十六歲。翌年，李太夫人六十正壽，親舊多來祝嘏，衡陽曾農髯亦遠道來。是歲十二月，先生座師陸潤庠逝於蘇州，先生特往弔祭之。是年習麻姑仙壇記甚勤，多達四十九遍。

民國五年，胡漢民亦在上海，自春至秋，先生與胡先生過從甚密。國父在是年三月間，亦自日本返國住上海，策劃討袁運動。先生因胡先生之介，得謁國父，是爲先生親聆國父言論之始。袁世凱之帝制自爲，先生反對甚力，曾致電袁世凱責之曰：

「自帝制發生，國人皆知禍至之無日，忠告已多，未聞聽納。遂至五國警告，滇桂舉兵，民怨沸騰，親離衆叛，財匱於內，兵禍於外，禍在肩睫，無可諱言。若使兵連不解，生靈塗炭，強鄰責言，勢所必至，國固不堪，公亦無幸。……今日之事，與其以兵力解決，寧公自解決之。公若以救國爲心，民意爲重，則宜退位，翩然遠行，國家之任，還之國民；是非之公，付諸後世。國人感公高義，必無後患可言。爲國計，爲公計，無逾於此者……」

先生這通電報，善人盡善言而已，但亦以見先生身雖在野，對國家前途，關切至深。是歲六月六日袁

世凱愧憤而死，黎元洪繼任總統。黎在武昌危急時，得譚氏之助，至此明令任爲湖南省長兼督軍。八月十二日至長沙就任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。先生重主湘省軍政，一本初衷，以裁兵節餉，減輕人民負擔爲第一要政。時湘軍本有四師，譚氏縮編爲兩師，一、三兩師合爲一師，以陳復初爲師長，二、四兩師合爲一師，以趙恆惕爲師長，這是先生任職後不到一個月的事情。先生之赴長沙就職，李太夫人等仍住上海，至十一月李太夫人病危，先生得訊，趕回上海，則已不及與太夫人見最後的一面了，風木之痛，實爲先生內心最大的遺憾事，是年十月黃克強先生逝世，先生挽以聯云「當世失斯人，幾疑天欲亡中國；遺書猶在篋中，此行吾愧負生平。」十一月蔡鍔亦逝，先生挽以聯云：「天地一英雄，出死入生，提挈河山還故有；邦家兩愁慘，眼枯淚盡，艱難身世復何言！」意又未盡，故又挽云：「心事如白日青天，遂使貞誠同幻運；家國正風瀟雨晦，況兼孤露哭餘生」。家國與故舊之痛，溢於言表了。

翌年六月，先生在長沙召集上校以上軍官開會，宣示湖南此後之宗旨，爲保境安民，是殆自治之濫觴。先生之所以出此，是因爲北方政局，頻起變化，先是政府與國會之間因參戰案而發生衝突，黎元洪站在國會這一面，免段祺瑞國務總理職，段則以國務總理名義通電各省，引起督軍團之叛變，安徽倪嗣冲首倡獨立，河南、陝西、浙江繼之。黎恐，欲藉張勳之力爲折衝，而張至京則擁溥儀復辟，迫黎元洪解散國會。段祺瑞起兵馬廠，擊敗張勳，仍掌大權，黎無奈，讓總統位於馮國璋；於是對德宣戰，勢在必行，段祺瑞乃得日本之大借款，以謀武力統一。如此，湘省首當其衝，故爲保境安民說以全湖南。但亦深知保境安

民不足以抵制北洋軍之侵入，故令劉建藩爲零陵鎮守使，以留與南方呼應之餘地。

國會既被解散，議員紛紛南下，集會於廣州，舉國父爲大元帥，這是護法運動的開端，南北對峙之局已成。國父就任大元帥後，以護法爲號召，劉建藩卽於此時通電響應，宣告自主，便是先生預先的部署。九月，先生卸職赴滬，馮國璋令傅良佐督湘。其時護法軍由譚浩民爲總司令，北出零陵，下長沙，傅良佐走避，段祺瑞亦去職，而湘人望治心切，北洋政府乃重命先生督湘，先生拒之，於是張敬堯兄弟的北洋軍入湘，張敬堯且繼任了湖南督軍，湘民自此入水深火熱之境了。

譚畏公卸任湘督後，赴滬家居。民國七年二月，國父手書先生，促贊助護法。先生應命赴粵，經桂返湘，過武鳴時，廣西督軍陸榮廷宴先生於其家祠。陸榮廷、譚浩民等廣西籍軍人，對大局實有控制的力量，國父後來辭大元帥職，卽係受制於陸等之故。後來非常國會修正軍政府的組織，改設七總裁，國父與伍廷芳均不就，以不合作的態度以制裁之。先生離武鳴後，過蘇橋，宿於同年張其鐙子武之家，並相偕入湘。張其鐙在譚畏公湖南都督任內，曾任軍事廳長，故對湘省軍人認識甚多，由他同行，對譚畏公的幫助甚多，時北洋軍之進入湖南省者爲吳佩孚所部，攻勢甚銳，陷長沙，下衡陽，零陵湘軍，正舉行會議，將撤守永州，禦敵嶺外。譚畏公亦無如何，但張其鐙獨不以爲然。他建議由他將三百人守零陵爲疑兵以張聲勢，而令諸軍從容後撤。吳佩孚長趨南下，未遇勁敵，及至永州，驟見陣容嚴整之張其鐙所指揮的湘軍，認爲強敵，不敢輕進。張乘間移書吳佩孚，約定兩軍劃地而守，並陳以利害，使明形勢。張子武是天

下聞名的才子，吳佩孚心儀已久，夙重其人。自此兩人結爲兄弟，吳佩孚主張自衡陽撤軍，通電全國，主張南北和議，殆亦爲張其鎰的建議。自此，吳之聲名藉盛，張亦死心塌地的爲吳效勞，最後葬身於北伐軍追擊吳軍於豫鄂邊上的構林關。譚長公以詩弔之，有「平生誤感恩」之句，蓋悲其遇也。民國七年之南北和議，南方以討論陝西靖國軍問題爲中心，此項會議即由此而來。當先生頓旆零陵時，方夫人卒於上海，先生聞耗，素食百日，自此終生不談續弦之事，先生真性情中人，時先生年四十歲。是年九月，馮國璋代理總統期滿，所謂新國會選徐世昌爲大總統，段祺瑞亦免內閣總理職，但政府大權，仍受段之操縱，北洋政府仍是換湯不換藥的老模樣。

吳佩孚北去以後，湘人張敬堯兄弟之暴虐無狀，湘軍乘間北進，趙恆惕、魯滌平長趨進擊長沙，易家灣一役，激戰最烈，趙恆惕軍攻長沙克之。這是民國九年的事情。譚長公跟着進駐長沙，復任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。時北洋軍馮玉祥部尙駐湘西，先生以協餉使其北返，湘省全境自此爲湘軍所控制。那個時候的湖南，將驕兵悍，吏蠹官詐，而湘人則望治心切。譚氏處此情勢之下，發揮了他處置問題的長才，他宣布湖南自治，軍民分治，省長由選舉產生，並把省長職務由省議會選舉議長林支宇代理，而把總司令職務交給趙恆惕，把全省軍隊仍然合併爲兩個師：第一師師長由宋鶴庚担任，轄賀耀組旅（第一旅）、唐生智（第三旅）、黃輝祖的砲兵團、何鍵的騎兵團；第二師師長爲魯滌平，轄劉鈞旅（第二旅）、唐榮陽旅（第四旅原爲鄉序彬）、戴岳的砲兵團、葉琪的騎兵團和新成立的劉鳳的補充團。他自己則解職赴滬，暫作

寓公。宋鶴庚和魯滌平兩位師長，都是對譚長公很親敬的。因此，他這一部署，雖然放棄了湖南的軍政大權，但對湖南的局勢，仍有制衡的作用。先生蓋仍以鄉邦父老爲念，並爲革命前途作一準備也。部署妥當，解職赴滬，那是這一年的十一月，呂苾籌偕行，舟過洞庭，適方夫人靈柩至，呂恐觸先生悲痛，因勿令知，渠但過船一弔而已。事後，先生始知，引爲大憾。方先生在處理軍政諸事時，國父兩函先生，囑出兵廣西，平桂亂以靖兩廣之患，使鄰省亦得自治之利。但先生處境亦甚艱難，故未能從命，及先生赴上海，而國父亦因受廣西派軍閥之扼制而至滬上了。先生與國父，時時通信，討論國家大事。自此，對國父之欽敬益深。

出售田宅捐獻軍餉

民國十年，非常國會選舉國父爲非常大總統，五月五日就職於廣州。未幾，下令攻廣西，廣西軍閥陸榮廷所部，到處崩潰，陸本人逃奔越南，不及三月，全桂底定。國父乃親至桂，組織大本營，準備北伐。先生在滬，策劃籌解湘省餉銀達數十萬之多。吳佩孚雖在民國七年，自衡陽撤軍，侈言南北和議；但其主要因素，實係直皖兩系軍閥已近短兵相接的關係。及皖系失敗，直系控制華北，中原與江漢平原，兼制湖南，遂師段祺瑞之故智，依然主張武力統一。他的進行步驟，是聯絡湘省的趙恆惕和廣東的陳炯明。吳陳均爲秀才，這便是當時所稱之南北兩秀才攜手合作了。陳炯明時任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及陸軍部長等要職

曾電致先生，表示不贊成國父的北伐，先生因知陳炯明必叛，其後固不出先生所料。由於陳炯明在後方作祟，對北伐軍不作絲毫的接濟，對力任 國父補給的粵軍師長鄧鏗予以暗殺，國父乃免陳炯明的部分職務，改道粵漢鐵路北伐，大本營設於韶關（今稱曲江），分兩路前進：一路向贛南挺進，一路則北入湖南。入湘之師，甫至邊區，而湘省各處代表，阻止北伐軍入境。由此，可知吳佩孚聯湘政策，已有相當成功。此不僅因北洋軍勢力雄厚，兼以湘省軍政人員有患失之心，欲以保全地位之故。惟入贛之師，進展相當順利，不僅底定贛南，且攻向吉安而佔之。時陳炯明已被免粵軍總司令及粵省長等職，專任陸軍部長。陳部要挾 國父，恢復陳之原職。

國父因回廣州鎮攝，留胡漢民代理大本營職務。詎陳軍竟告叛變，自白雲山發砲攻擊總統府，國父乃避往永豐艦，繼續指揮討逆軍事，故總統 蔣公在滬，聞粵變，冒險前往，登永豐艦佐 國父指揮軍事。旋以由贛回師之北伐軍受阻，聲勢隔絕，盱衡局勢，多留無益，乃奉 國父離粵返滬。先生因得與 國父往來，幾無虛日。先生曾云：「與 總理常相處，得一教訓，即天下事無所謂成敗之說也，事前種種着急，皆屬多事」；又云「革命領袖，非孫公莫屬」。由此可知先生自此對 國父之認識更深。先生之以賣田宅所得五萬元，捐獻供 國父作軍餉之用，實以此故。時民國十一年，先生年四十四歲。其時直奉聯軍已打垮皖系，直軍又驅逐奉軍出關，受皖系卵翼之徐世昌因而鞠躬下台，由黎元洪復職。黎元洪改組內閣，徵先生入閣，任內務部總長，吳佩孚亦具函促駕，但皆為先生所拒。翌年，陳炯明被敗， 國父回粵任大

元帥，先生則於二月間南下至廣州，就任大元帥府內務部長。由此，可知先生出處進退之大節。年譜云：

「去秋，總理離粵赴滬，於西南軍事，遙爲部署。陳炯明既據粵，自任總司令，並聯絡閩督李厚基、贛督蔡成勛，商三省會師，以消滅退集閩贛之許崇智軍。十月，總理電令許崇智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，並派今總統蔣公爲參謀長。……中間，蔣公並返滬洽商輸兵運械辦法；復假道閩南，直取潮汕，會同滇桂軍分路入粵，一月十六日克廣州。二月十五日適爲舊除夕，公在滬，方有家宴，奉總理召約，未遑暫留，即隨軍艦赴粵。」

由此，可知先生對國父欽遲之深與奉命之敬。先生之任內政部長，便是這一年三月的事，五月調長建設部兼大本營祕書長。其時，廣東的局勢，還很複雜，軍閥餘孽，叛服無常，陳炯明尚頑據東江，沈鴻英又變亂於穗城附近。軍事倥傯，譚先生也就跟着忙碌異常。東征惠州之役，平定沈鴻英之役，先生都參與密勿，躬任其事。是年夏秋之交，吳佩孚於趙恆惕之間的關係，顯有增進，吳並欲藉之解決湖南問題，國父乃命先生任討賊軍總司令，轄有六個軍，即：第一軍軍長宋鶴庚，由鼎英暫代，第二軍軍長魯滌平，第三軍軍長謝國光，第四軍軍長吳劍學，第五軍軍長陳嘉祐，第六軍軍長蔡鉅猷（時駐湘西），此外還有若干別動隊等，如陳方度、唐收廈、李韞珩、廖斯甲等。先生就任總司令，在出發之前，對趙恆惕、宋鶴庚發表通電云：

「湘以甌脫自居，保境息民，尚可爲人所曲諒；若引致敵兵，自殘同志，則是甘與正義爲敵，後

有千秋，何以自處？」

此電所指引敵兵自殘同志，就是指趙恆惕與吳佩孚勾結而言，蓋以正義責之也。於是先生進駐湖南，以衡陽的彭剛直公祠堂爲總司令部，發表上述六軍軍長及各路別動隊司令，湘軍第二師長魯滌平等立即響應，張輝瓚率蔡鉅猷軍二團，自湘西以奇兵突襲長沙，省城遂下，先生頗加贊賞。會陳炯明與蔡成勛聯合，阻撓北伐。蔡攻曲江，陳攻石龍，廣州頓呈緊張狀態。國父乃命先生率師回援，先生乃整師南下。時蔡軍已陷始雄，陳軍已陷石龍，諸軍聞湘軍回援，士氣大振，卒驅蔡軍出粵，驅陳軍返東江，穗城因得安定，時民國十二年，先生年四十五歲。其時北洋政局又有變動，黎元洪被直系軍閥所迫而下台，曹錕集舊國會議員於北京，以每票五千銀元的代價，賄諸議員而選爲總統，時人稱北洋議員爲豬仔議員，稱曹錕爲賄選總統，政以賄成，軍閥政府之腐敗，從此可知。

統領湘軍奮勇討賊

時國共合作，已告成議，國民黨容許共黨黨員以個人參加國民黨，國民黨乃改組。民國十三年一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選舉中央執監委員，先生被選爲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務委員，大元帥麾下之各軍，改稱建國軍，並以省名冠之。先生所部湘軍因改稱建國湘軍，仍由先生任總司令。其時先生統轄的湘軍，計有五軍三縱隊，第一軍軍長爲宋鶴庚，第二軍軍長爲魯滌平，第三軍軍長爲謝國光，第四軍軍長爲吳劍

學，第五軍軍長爲陳嘉祐，第一縱隊司令爲李抱冰，第二縱隊司令爲廖新甲，第三縱隊司令爲魯蕩平。時陳炯明殘部仍竊據東江等地區，建國湘軍奉命討賊，先生親督所部，勇猛擊敵，遂克河源。但湘軍子弟，都生長於中部地區，時粵東的副熱帶氣候，不易適應，軍中因而疫癘盛行，死病相繼，先生親往慰問，不得已而班師，先生所部，號稱五萬，但軍餉與軍械，均感困難，則以廣州餉源都被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環所把持，但先生遵守法制，嚴禁部屬染指稅捐，雖窘不顧，而其部屬亦被先生所感格，無一人敢逾越規範者，由此可知先生的政治家的風度。國父改組軍事委員會，任先生爲九委員之一，由此，可知國父對先生倚畀之重，是年十月，國父決心北伐，並親自督師，駐節曲江，而以胡漢民駐廣州，任後方調度之職。當時的北伐軍爲贛軍全部，湘滇豫各軍的一部分，其北伐聯軍總司令一職，則由先生担任。先生乃以宋鶴庚爲中央總指揮，朱培德爲左翼總指揮，盧師諦爲先遣隊總指揮。國父勗勉先生說：「革命前途，只有進取：出兵比不出兵好，打敗仗比不打仗好」，先生乃駐曲江，指揮北伐全局。北伐聯軍首克贛州，直指吉安，軍鋒所至，勢如破竹。但是宋鶴庚這個一向被先生所倚畀的人，對軍事指揮，似乎有些偏激，只注重前方的進取，而不注意後務的鞏固；以致被敵軍所乘，前方根本重地的贛州因而失守，宋本人竟棄軍而遁回湘省，這是先生最痛心的事。先生乃在南雄設收容所，接待前方退回各軍，湘軍則乘比機會，作了一番整理，改爲六團，取消軍師旅長等高級頭銜，汰弱留強，以節開支，所有團長皆改由先生直轄，並設砲兵訓練處及講武堂，以安置現役及編餘軍官，講武堂堂長由陳嘉祐担任，教育長由譚道源担任。其

軍餉來源，則取諸北江的稅收，按名發餉，兵無虛額，士氣因此大振，成爲革命軍的勁旅。是年，吳佩孚征關外失敗，馮玉祥稱國民軍，回師佔北京，曹錕被囚，段祺瑞爲臨時執政，國父北上參加國民會議，不幸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。噩耗傳來，南中震動。先生乃南至廣州，與故總統蔣公及胡漢民等一面治喪，一面通電全國，誓遵國父遺志，繼續努力革命，人心賴以安定。國父之喪，對先生刺激甚大，憂鬱成疾，本患疹癰，其時左股幾成廢疾，入穗時已甚痛苦，至此益劇，乃割治之，手術再施，始告痊癒，對先生之健康，影響實大。

其時，廣州的形勢，實處在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環等的控制下。二人雖在革命的旗幟之下，但其行動實與軍閥無異，其一手控制了廣州的稅捐之外，又復橫征暴斂，包辦了煙賭兩捐，故爲廣州人士所深惡痛絕。楊希閔的滇軍，本爲唐繼堯的嫡系部隊，裝備甚爲精良，戰鬥力頗強。唐繼堯被顧聘珍所逐時，抵抗無效，乃輾轉至粵。至此，唐有回滇企圖，楊遂與唐繼堯相勾結。時黃埔軍校師生所組成的教導團，正以破竹之勢，破陳逆炯明餘孽於東江及潮汕；楊劉又深恐黨軍勝利之後，對楊劉不利，故協謀在穗作亂，遙爲聲援。廣州在此種情況下，已在滿城風雨的緊急態勢了。先生與蔣公密商，決定討平大計，先將大元帥府移於河南的安全地區，先生間道至北江湘軍防區，南下，拊廣州之背；蔣公則率教導團與粵軍，自東江進迫廣州。楊劉雖頑抗，但是經不起兩路銳師的夾攻，不匝月而潰敗，遁往香港，以保殘生。廣州局面，自此始完全在革命軍控制之下，再無後顧之憂了。是年六月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，決定改

組大元帥府爲國民政府，改組各省建國軍爲國民革命軍。國民政府委員共十六名，先生被推爲委員後，又被推爲五常務委員之一。軍事委員會改組，先生又被推爲八委員之一。國民革命軍改組完成，蔣公任第一軍軍長，先生爲第二軍長，而以魯滌平副之。陳炯明殘部以楊劉叛變而得喘息之機會，浸浸而又謀西取廣州，並勾結駐防北江的川軍熊克武部與南路的粵軍鄧本殷部，妄圖三面對廣州壓迫前進。蔣公再度東征，指揮一、二、三軍各軍，逆襲西進之陳部，經兩週激戰，克復了夙稱天險的惠州，不二月而陳逆殘部完全肅清，熊克武不敢動，鄧本殷則退守海南。是年十一月，熊克武被扣留，所部解散，其在北江餘孽，先生命魯滌平率部掃平之。十二月，國民革命第二軍入海南島，肅清鄧本殷殘部。廣東全省，至此始全部入革命軍之掌握，乃得進一步爲北伐統一的準備工作。

民國十四年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，主席團七人，先生則爲主席團之一。中央執行委員選舉結果，先生獲選，並被推爲常務委員及政治委員會主席。沈鴻英部桂軍，旣被逐於廣東，退至桂東北的全縣一帶，亦與唐繼堯勾結，圖謀割據，其時間略與楊希閔勾結唐繼堯的同時，大本營爲對付此種逆謀，乃於十三年十二月令李宗仁爲廣西綏靖督辦，以黃紹竑爲會辦。中央援助李黃，廣西因此而平定。先生因有梧州之行，與李黃會商兩廣統一方案。其內容如下：廣西接受國民政府命令，處理省政，廣西軍隊改編爲國民革命軍；廣西財政受國民政府監督，這些都是先生與廣西當局會商的結果。故先生返廣州，而中央政治委員會即通過兩廣統一案，並任命黃紹竑爲廣西省政府主席，李宗仁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。

。是年七月，二屆中委全體會議，推選 蔣公爲常務委員主席。其時的中央，分黨務會議與政治會議，蔣公率師北伐，其在中央的職務，分別請先生及張靜江先生代理。先生代理的是政治會議主席。其時，先生又被推爲國民政府主席。是年六月，中央二屆中委臨時全體會議，決定北伐，由國民政府任命 蔣公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七月一日軍事委員會下動員令，九日， 蔣公就職，卽由先生授印。

民國十五年的北洋政局，又有新的變化。段祺瑞亦不堪軍閥的壓迫，是年四月宣告下野，北洋政府暫由顏惠慶以國務總理名義代理。時張作霖由關外深入河北山東及河南的一部分，吳佩孚掩有長江中游及黃河中游的地盤，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，由直系軍閥分離出來的孫傳芳，開府南京，自稱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。吳佩孚與孫傳芳爲北伐軍的正面敵人。其時吳佩孚的影響力已及湖南，湖南省長趙恆惕部下的第四師長唐生智，與趙恆惕之間裂痕頗深，趙密謀對付之，唐則投於革命旗幟之下，接受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的任命。北伐軍在湖南有了唐生智作開路先鋒，故以湖南爲北伐的第一目標，對孫傳芳則採取監視的態度。在北伐計劃中，先生所屬的第二軍與朱培德的第三軍，隨同 蔣總司令北伐，但頓兵於湘贛邊區的茶陵、攸縣、醴陵一帶，卽係對孫傳芳作監視與警戒。先生命教導所留粵訓練，命魯滌平代率四、五、六各師隨 蔣公北行，臨行，諭魯曰：「前方軍事，託以全權，有須用延闔名義者，請逕行之，不遙制。」先生對魯信任之深，由此可知。

北伐軍入湘之後，克長沙，汀泗橋一役，已奪吳佩孚軍之魂，於是，圍武昌，克陽夏，北進至武勝關

，勢如破竹，這一路戰事告一段落，乃對第二敵人孫傳芳作兩路攻擊。先是，對孫傳芳採取監視的，尙有何應欽所率的第一軍的一部份，屯兵於韓江流域，時周蔭人任閩督。湖北戰爭告一段落後，蔣總司令親率大軍自湘東入贛，對贛方的孫軍作總攻，何應欽亦率東路軍入，萬壽宮一役，已奪孫軍之魂；而東路軍亦於松口之戰完全勝利。這兩方面的軍事，均呈破竹之勢。南昌既定，蔣公電先生主張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應速遷武漢，先生因於是年十二月十一日自廣州出發，三十一日抵南昌，與蔣公相晤，盤桓至三月初旬，始抵漢口。北洋軍閥在吳佩孚節節敗退後，組織所謂安國軍，推張作霖爲大元帥。孫傳芳自江西敗後，自知非國民革命軍的對手，乃投於張作霖的懷抱，請其援助，張作霖乃命褚玉璞軍進駐南京，作爲對孫傳芳的支援。

武漢清共出力最多

中央遷至武漢之人員，分爲兩批，隨先生北上者爲第二批。其第一批人員之抵武漢者，無論黨部與政府，都被共黨分子滲透，接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操縱。鮑羅廷對於北伐，本採陽示讚成，陰謀阻撓的策略。及其陰謀不逞，乃乘中央黨政機關北遷的機會，使用竊據篡奪的陰謀，轉變國民革命之領導中心。此種陰謀，先生殆早有所聞，其滯留南昌而不即去武漢，殆以此故。十六年二月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決遷徙案，始於三月七日離南昌而至漢口。其遲遲不行而終於去漢者，殆得蔣公之同意而爲武漢分共之伏筆歟？此

0

可在此後武漢的分共運動中先生實爲中心人物，可以窺知其中的消息。

民國十六年是國民黨清共與分而復合的關鍵。蔣公於定都南京後，即清除共黨分子；武漢以先生爲中心的部分中央委員則在七月間兩次發表聲明，嚴厲指斥共黨分子的逆謀，毅然實行反共清黨，其進行的時間後於南京約三個月。此中原因，則以武漢的中央黨政機關，均有共黨分子竊入，不能不從事於反共的中央委員聯絡之故。先生年譜，有云：「公斡旋於反復支離之局勢中，舉手投足之間，無一而非世局國脈所關」，由此可知先生在武漢清共運動所處地位之重要性。在底定江南的北伐期間，先生所轄的國民革命第二軍，由魯副軍長率領，隨蔣公北伐，担任對孫傳芳江西部隊的警戒與監視。及蔣公揮師入贛，第二軍隨同作戰，所向克捷。及江南底定，乃自贛東入浙，與東路軍合力攻浙，歸東路軍指揮，浙江底定後，則歸江右軍總指揮程潛指揮，參加攻取南京之役。第二軍始終隨蔣公作戰，由此可知先生身在武漢，心在京滬了。南京光復以後，第二軍輾轉戰於皖鄂之間，建功甚多。中央乃將第二軍擴爲兩個軍，即從第二軍中分出一個十四軍來。至此，先生始解二軍軍長職務，魯滌平擢二軍軍長，陳嘉祐任十四軍軍長。中央對第二軍依畀之重，由此可知。

出任國民政府主席

武漢既行清共，寧漢之間的基本政策，遂相一致，於是雙方進行團結會議，寧方由居正等爲代表，漢

方由先生及于右任等爲代表，在廬山進行會商，結果圓滿，先生遂乘軍艦赴京。時孫傳芳的江北殘部正渡江猛撲，其左路則在南京之上游亦謀渡江，因對江面發砲，而先生座艦適在此時經過，先生從容鎮定，行若無事，卒能安全抵京。先是，國民政府是在年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，中央政治會議發表宣言，以遵奉國父遺命爲號召，並將迎奉靈柩歸葬於鍾山之下。隨即舉行各團體祝捷大會，歡迎先生返京，行使職權。至此，先生真的返京了，時因龍潭之役，政府要人居滬者多；先生抵京後，不久即赴上海，挽胡漢民返京，協力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，推動黨政工作，完成國民黨之團結。翌年召開國民黨二屆中委第四次全體會議，會中決定修改國民政府組織，改委員制爲主席制，明定國民政府受國民黨中央執行會之指揮與監督，並遵國父遺教，設立監察院與考試院，完成五權憲法的構想，先生則推爲國民政府主席，不久又在四中全会後代理政治會議主席，時先生年五十歲。

寧漢自分立而團結的過程中，蔣總司令下野，四中全會前後復職。十七年四月一日，蔣公督師北上，進行第二期的北伐，以津浦鐵路一線爲正面，由蔣公親自指揮。大軍所向無敵，五月一日佔領濟南。日本軍閥深忌中國的統一，在第二期北伐開始時，即以保僑爲藉口，移其福田師團於濟南，阻撓國民革命軍前進。五月三日慘殺我濟南交涉員與軍民甚多，是爲五三慘案。中央政治會議，推先生北赴徐州，與蔣公會商國是。當時我們的國策，以「不屈服、無抵抗」爲原則，繞道濟南，北渡黃河，五月十七日克德州，六月二日克滄州。北方的所謂安國軍已知無法與國民革命軍作戰，張作霖於六月四日倉皇出關。日

人對張作霖之出關，深惡之，乃預置炸彈於皇姑屯車站炸斃之。國民革命軍六月五日佔北平，十二日佔天津。張作霖之長子學長繼統東北軍，於十二月宣告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接受國民政府命令。紛擾割據多年的國家，至此統一。是年十月，中央遵照建國大綱的規定，宣布訓政時期開始，頒布訓政大綱修正

國民政府組織法及五院組織法。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任先生爲行政院院長，自此即以行政院長終其生。

十八年一月，先生以行政院院長身分，發表演說於中央政治會議紀念週，闡述循禮守法的意義，冀以此達成中國政治之改革。這一篇講詞，可以看作先生的施政方針，時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，先生年五十一

歲。時舊曆尙爲十二月，十四日爲先生五十一壽誕，其長公子伯羽夫婦率孫女自柏林返，特爲先生祝壽，

長公子去國已多年，時尙未成婚，故此次返國，先生既見媳，又見孫女，精神最愉快，是年三月，國民黨

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揭幕，先生爲九位主席團之一，繼續當選爲中央委員及中央常委。四月，以風疾赴上

海休養，往宏恩醫院者三個月，病中又臨麻姑仙壇記二百又三遍，此爲先生最後之臨帖，公餘事書，病中

又事書，先生是最善於利用時間的黨國要人之一。六月一日，國父靈柩移葬於南京紫金山之陽，其碑文

爲先生所撰，紀念碑「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」，亦爲先生手書。九月病癒

，由次女公子祥侍返南京，移居於成賢街的一座西班牙式的洋式洋房，右爲中央大學本部，左爲中大農場

，朝夕聞弦歌之聲，二樂也。

民國十八年，國內又成多事之秋。時國家統一，海內宴如，政府爲節省軍費以便致力於建設，於是召

開編遣會議，縮減軍隊。但是舊軍閥之搖身一變而爲革命軍者，掛革命軍的招牌而意欲爲新軍閥者，皆採反對態度。李宗仁首倡反對之議，閻錫山、馮玉祥繼之，黨棍子汪兆銘又附和之。四方面聯合爲亂，召開所謂擴大會議於北平，閻馮李等並有電要求與蔣公則率大軍馳騁於中原戰場，至十九年十月閻馮等下野，國家始重歸統一，是年九月二十一日午後，先生作書數通，一致弟瓶齋，一致長女淑，一致內姪方世洪，一致沈文肅葆楨之子演，書竟，出觀盤馬（先生最喜看馬），途中猝患腦溢血症，急言須至，延至二十二日而溘然長逝了。蔣公聞訊霸悼，全國人民聞之，亦莫不以失此慈祥愛民的政治家而悲慟。國民政府特令褒揚，並撥治喪費一萬元，令鈕永建等爲治喪委員，國葬先生於靈谷寺之東，是卽後日成，蓋殊榮也。國葬後，刊有譚故院長國葬典禮紀念冊，其日記、詩文、文電等皆由長公子伯羽搜藏於上海赫德路寓廬。國葬紀念冊載有先生事略一文，甚簡要，蓋絃先生生平之大事而已。國史館是否已爲先生立傳？皆待查；其存滬寓之資料，不僅有關先生行誼的原始資料，且亦爲那個時期的國史之部分原始資料，如有損失，則誠國史之重大損失了。我們但望它完整無恙。

佳言卓行足資矜式

胡漢民先生是先生在黨國要人中的至好之一，自民五在滬訂交後，公私情誼，與日俱增。先生逝世時，胡氏任職立法院院長，曾在立法院的紀念週中，作追悼先生的報告，茲摘錄其要點如下：

「……上星期一，譚組安先生不幸急病逝世，這是黨國的大損失。……譚先生的人格和事業，在我們革命過程中，總是不可得的一人，兄弟今天在十二分痛悼之餘，想提出尤其值得我們則效的幾點，與各位共勉：

譚先生休休有容，具有古人所謂宰相的氣度，他的性格，祇有和平中正四個字，可以得其大略。兄弟與譚先生相處十餘年，從未見其疾言厲色。有時有人為什麼問題互相爭持時，譚先生一來，往往令人意消；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，一經譚先生區處，也就十分妥貼了。所以有人視譚先生為藥中甘草，幾於攸往咸宜。但是，譚先生在工作中，不僅是隨便配和的甘草，而是在配合之後，能使我們的工作，發生偉大的效能，顯出異常適當的工作的。……

譚先生天資明敏，自小便能以能文章為士林所稱賞，而其精到練達，更非普通人所能企及。少時，在兩廣督撫幕中，遇到疑難的公事為他人所不解的，祇有譚先生瞭如指掌；而且區處條理，都能恰合分際。但譚先生生平，絕不願以此見長，他的一切，都蘊藏而不外露。……譚先生雖然和平，但在緊要關頭，却又大節凜然，從沒有絲毫苟且。……古人通而有節之說，也正是譚先生絕好的評語。

譚先生對於總理，常自恨其直接承教之晚，但他之於總理，真可以說心悅誠服的一人。他自民國

八、九年開始追隨總理，其後到廣東，……便人人都感覺到他是將來本黨的棟樑。有時他參與機密，決定大計，有時以一身負天下之重，但譚先生從不以此自炫，……這種惟重實際，不尚虛名的精神，正可矯正一切躁進者盜名欺世的惡習。……

民國十年，譚先生既到廣州，便要同湖南驅逐趙恆惕，總理許之，他便問道入湘，依照當時的情形，本可規復長沙。可是陳炯明在東江突然作亂，……當時省城兵力單薄，……便飛調譚先生回粵。譚先生奉召，盡棄了規復的各地，星夜來援，廣東大局，才賴以安定。譚先生既回，當時廣州各軍的力量，便以譚先生統率爲最大，……於是滇、桂、黔各軍以爲譚先生必將危及他們的設施，都人人自危，可是先生回粵以後，便再三聲稱現在敵軍既已退回東江，我們也不該逗留後方，自甘暇逸；應該趕緊前進，將敵人消滅，掃除我們革命的障礙。當時駐省各軍都不爲動，祇有譚先生獨提湘軍，努力猛進。……於此更可見譚先生服從總理、矢志革命的一斑。

東江未定，總理又調湘軍回大本營！當時在大本營的各軍，軍紀之好，以湘軍爲最。十二年，總理北上，臨行交下兩個命令：一、命譚先生代負北伐的軍事；二、命兄弟留守廣州，代行太元帥職權，並負責肅清東江。兄弟便到總理跟前，對總理說：……據我的推測，肅清東江，可不成問題，……至於北伐，便不能不替組安爲難。……總理說：一切的事，我都知道，你們儘管去做吧……總理北上以後，兄弟便找譚先生商量東征、北伐並處理廣州善後計劃。譚先生慨然負起總理所交與北伐

的責任。他說：既是總理主張了，不管難不難，我們不能贊一詞，祇有努力去幹。……這種效忠主義，堅強不屈的精神，真可爲我們的法式。

其後，總理病危在北平的電報到廣州，兄弟即日找到廖仲凱、伍朝樞諸同志和當時代負軍政責任的同人，告以總理病狀，共商善後大計，並說：大元帥職權，實不當再行代理，最好能將大元帥府根本改組爲政府，並採用委員制，使全體同志，能有共同負責的機會，廖仲凱同志等便統統贊成。及後，我們得到總理逝世的消息，譚先生也正從北江回來，兄弟便將所定的計劃告訴他，他沉思有頃，便很嚴正的告訴兄弟：你的計劃是對的，可是此刻萬不能行，請你再勉爲其難吧！其態度的堅決，真爲兄弟所少見。兄弟當時本知道如果馬上更張，一定會發生糾紛，自聽了譚先生的話，祇好暫時不提起了。……次日晚上，兄弟和譚先生在楊希閔處吃飯，譚先生非常興奮感慨，大發其我們聞所未聞的言論。他首先痛責自己，敷陳自己的錯誤；並說：孫先生在世的時候，我們祇是一知半解，遇到任何困難的事，還可向他請示，可是膽小而無知，我們常常狂傲自大，不肯切實服從孫先生的命令，這真是罪大惡極，萬無可恕的地方。現在孫先生死了，一知半解的我們，更失了指導的人，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努力，才能免爲孫先生的罪人呢？又說：我一生佩服的祇有孫先生……便是我的同鄉黃克強，也祇佩服得一半，今後大家如果祇圖私利，不能遵照孫先生的遺教，完成革命，便是孫先生的叛徒。這一席話，真是大義凜然。當時楊希閔等統統在座，也相對默默。普通人只知道譚先生不善辭令，却

不知道他能時然後言，而事實上又往往由他中節之言，呈顯出偉大的功效！

當十三年，譚先生從東江回來，兄弟……很不經意的說，關於軍事，現在繼起有人，我們也終於攪不慣，將來如有機會，還是回復我們書生的生活。……十七年，兄弟自海外歸來，與譚先生見面，……譚先生首先和兄弟說：胡先生，你的書生不帶兵主義，我現在已經實行了。……在軍事上，他曾作過總司令，總理北上，並曾主持北伐事宜，在政治上，他做到國民政府委員，並當過主席，但譚先生從不介意到名位和權力。……當十五年我出師北伐，公舉 蔣介石先生任總司令，其實譚先生的資望歷史，都比 蔣先生好，譚先生却欣然做北伐軍第二軍軍長。固然，資望比 蔣先生好，乃至努力革命，甘心下人的，本不止譚先生一人？……但由譚先生如此，即有一、二不明大禮的將領，也不敢有違背了。……十七年秋，兄弟回國，向中央各同志建議設立五院，以應革命的需要。當時譚先生便忘了他主席的地位，很誠懇的對兄弟說：假如我還能服務，可否給我做些考試的事？最後，我們推定 蔣先生為主席，譚先生為行政院長，他也就慨然不辭，切心為行政努力了。譚先生的字典中，大抵沒有名望權利等字樣，他是真能行總理以服務為目的、不以奪取為目的的遺教的。這種鞠躬盡瘁，效死黨國的精神，真可為今日一切專事奔競的青年同志的模範。……

譚先生從前豪飲健飯，因此凡找到醫生，如果許他飲食自如的，便以這位醫生為通達；如果為他多立戒條的，他便以為不行。他說：我以前吃錯喝錯，何必現在戒它，反令我感受痛苦呢？有一位醫

生曾爲譚先生作精密的診斷，結果告訴譚先生說：依你的病狀，將來有兩個死法：（一）得急病——腦充血而死；（二）由半身不遂而死。譚先生告訴兄弟：這兩個死法，假如由我自擇，我必定選擇第一個。……這個事實，我們……仔細想來，則譚先生實有其人生觀，……在譚先生抱定生與死爲萬物變化之迹，爲人所不能逃，如果悅之惡之，甚之爲苟全命計，勉強節制，便全然沒有生趣了。……兄弟以爲一個有抱負能做事業的人，對於生死，必定總有一個超人的見解；不過假如普通人本沒有知識，却不能以此藉口，以致放縱頹廢，弄到馬援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，這一層是大家應有的認識。……」胡氏風骨嶙峋，知人論世，少所許可，獨對譚先生推崇若此，而且他許多見解，都根據他親自經歷的若干革命祕辛，由此益可見譚先生的偉大處。

至於先生的「吃錯喝錯」，實與其掌廚有關。掌廚者非他人，即當時著著名的曹廚子。此人燒得一手好菜，善伺主人之意，隨時聽從指點，精益求精，當時譚公館的菜餚之精，聞名於南京。一日，張道藩先生慕其名，當着譚畏公的面，請他做幾樣菜，譚畏公即囑曹廚子出，道藩先生授以銀幣四十枚，當時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，普通魚翅席，十五、六元即已不錯。詎廚子接銀在手，拋之不已，意甚勉強，弄得張道公不好意思。及期菜出，不過五六味，果然樣樣精緻，嘗所未嘗，大快朵頤，與宴者大家稱快不已。胡遯叟耐安先生在譚畏公幕任祕書多年，在廣州時，有時伴譚畏公進餐，亦稱其口福不已。由此，可知曹廚子做的菜，使譚畏公胃口大開，他的豪飲健飯，當與曹廚子做的好菜有關。據說曹廚子一直稱譚畏公爲三少爺。

，及其貴爲國府王主席及行政院長，亦不改稱云。台北市的湘菜，亦極著名，主其事者爲彭某，以譚廚爲號召，舊日的天長樓、玉樓東等，以及今日的華湘等，均爲彭某所主，聲譽頗高。一日，譚畏公之長公子自國外返台北，親友爲宴款待，約彭某親來做好菜，席間並介紹做菜者爲譚府舊人，伯羽先生命出相見，則謂：此乃我家選菜洗碟之副手。副手藝已如此可觀，則曹廚子本人之手藝若何？可不言而喻了。譚畏公享年僅五十二歲，曹廚子之忠心待主，其所得結果相反。此在譚畏公的人生觀視之，固無足輕重了。

作者對譚畏公欽佩至深，但一聆其言論者僅一次，時爲十六年秋季第四中山大學開學時，先生以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身分，出席致訓，其雍容大度之風采，已予人以深刻的印象，其詞簡賅，但其勉勵學生勤治學問，爲建國工作而努力，句句出自肺腑，感人至深。十九年下學期，作者執教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，其三女公子韻在高三國文班，時先生已謝世，但見其綴白花於髮際，頗令人回憶畏公之風度不已。來台後，一度兼中華日報，時譚畏公長女公子淑爲書畫展覽事，由郭外川學長之介，相識於席間，事後承贈法書一聯及紅梅立軸，鐵畫銀鈎，饒有麻姑仙壇意味，蓋家法也。畏公曾有句云：「書來女勝男」，洵不誣矣。

譚畏公對黨國之貢獻，因爲他深藏不露，故當時知者已不多，近讀黨史會出版的革命先烈先進傳，雖有譚延闓事略並附胡漢民先生在紀念週的紀念詞，仍嫌其所述過簡，乃詮次其事蹟，作較詳的介紹，但資料不足，掛漏之處仍所難免，但作者本意，在使一代偉人之佳言卓行，能爲後學所了解，所取法而已。

（原載中外雜誌十八卷五期至六期六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號）